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亡灵祭坛】	苍天啊，请告诉我，我的父亲在哪里？	李国治
【人物追踪】	潘复生晚年一席谈	赵宗礼
【劫后反思】	以忏悔唤回人性良知（下）	樊思清·孙怒涛·孙毓星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亡灵祭坛】

苍天啊，请告诉我，我的父亲在哪里？

· 李国治 ·

◇ 序

我的父亲李志光，1910年4月出生于河北唐山开平镇一个中农家庭。我的祖父李东林是晚清秀才，他知书达理，吟诗作赋，出口成章。祖父在当时的开平镇是位受人尊敬的文化人，做过私塾先生，刚一解放就被唐山市政府聘为市文史馆馆员，享年81岁。

父亲终生从医，生前曾任北京通州师范学校校医兼生理卫生教员。1959年后任河北省承德师范学校（1）校医、校务委员会委员。1966年文革初期，受林彪、江青反革命极左路线迫害，于9月1日在北京联动和本校红卫兵的残酷批斗中，被非人的酷刑拷打、精神折磨致死！终年56岁。

李志光（以下简称父亲或李）解放前曾在傅作义将军管辖下的北平国民党军队所属通县3759兵站医院任少校军医，并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这些就是他的全部“历史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李作为起义人员即参加了革命工作。工作后不久他就将自己的个人履历向组织做了彻底交代。经过1955年肃反运动等，组织上对他解放前的情况给出了明确结论：“属于一般历史问题”。并且，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通过了严格审查没有任何其他问题。1978年父亲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当年11月17日在承德师范学校给他作死亡结论的评价是：“李志光同志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曾把自己的医疗器械献给了学校。注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能够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积极钻研医疗技术，积极组织培养学生卫生员，注意宣传防治、保健卫生知识，热心为师生员工、家属看病。下乡为贫下中农治病并受到称赞。能够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纪律。在患肝炎病期间，也能坚持工作。能够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并能帮助同志提高业务技术。生活简朴，作风正派，能够严格要求家属及子女要听党的话，努力工作。”（见文末附录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党、对新中国充满热爱，充满感激报恩之情，对工作极端负责，为人民群众、为学生的健康付出了毕生精力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位曾经挽救过无数人健康和生命的好医生，却在生命刚刚走进56岁的黄金年月，在一场空前规模的浩劫中被以那样一种惨不忍睹的方式凌辱虐杀至死！

◇ 坎坷的前半生

父亲在旧社会度过了39年。那39年，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兵荒马乱，内战外战连绵不断的动荡岁月，父亲几乎没有过一天太平日子。从家中保存的一份父亲在1954年12月亲笔填写的“河北省中等学校教职工简历表”中，可以看到解放前那几十年他所经历的坎坷岁月。在断断续续读完高中后，凭成绩于1930年初到1934年末进入英国人办的开滦矿总医院做了五年的见习医生（相当于半工半读）。学成后又经唐山市医师资格考试合格，于1935年开始挂牌行医，先后曾在唐山丰润县城内东街、唐山任各庄北方医院、唐山市胥各庄及滦县乡村师范班任医师兼教员等。可以看得出工作极不稳定，几乎一两年就要换一个地方，生活当然惶惑不安。但经过那十几年的临床学习和加上1938年经人介绍，他有机会进入北京厚生医药塾研究班进修两年。父亲的医术已大有长进，尤其在内科和儿科方面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家中人口增加，父亲养家糊口的担子越来越重。为谋求好一点的生计，他想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去外面闯闯，便开始了携妻带子外出打工的生涯。先后在北京博济医院、徐州传染病医院、新民会保健医院和一些当时的杂牌军医院从医治病。中间甚至还因为犯“同情抗日向八路军资助药品和医疗器械罪”，他被判刑6个月，继而失业赋闲……就这样颠簸流离七、八年，父亲虽有一技之长却始终没有一份顺心稳定的工作，一家人连个可以安身立命的窝都没有。到抗战胜利后父亲在国民党傅作义部队中任少校军医，并于1947年去南京考试院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合格。但随之而来的是蒋介石在内战中的节节败退，就在傅作义即将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国民党为挽救败局在当时通州的3759兵站医院，父亲和几位有技术的人被要求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当天回家后他曾向我母亲表示对此事极不情愿。此后随着北平和平解放的实现，父亲又经历了几个月短暂的挂牌行医后，终于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便参加了革命工作，迎来了人生的转折。

◇ 感恩共产党 憧憬新社会

父亲参加工作后马上就被安排任通州师范学校校医兼生理卫生教员，一家人的生活也很快安定下来。由于父亲高超的医术，又有一颗仁爱之心，无论治疗还是防疫以及给学生讲课，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很快就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和学生们的尊重。这种信任和尊重不仅体现在专业能力上，也体现在政治信任上：当时的通县兵役局（即后来的县武装部）每年到新兵体检时，都会通知学校指定要请李志光参加。父亲参加工作不久工资就长到120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了。他曾对家人说，自己的工资比学校校长的还高。从1959年起他又获得了国家给予的高级知识分子待遇。

那段时间父亲的脸上总是带着舒心的微笑，真的是心中充满阳光。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旧社会的那点“历史问题”，更不知道自己还属于被改造与利用的对象。跟谁提起共产党和新中国，他都会竖起大拇指赞扬共产党英明伟大。到1955年，父母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间小四合院。漂泊动荡了几十年的家总算可以真正安定下来了。一个经历过旧社会战乱熬煎、饱尝过失业痛苦的父亲，当然十分珍惜眼前这来之不易的小康生活。然而，这样的安定日子只过了四年，1959年，为支援边远地区的教育，父亲带头响应国家号召，毅然离开了在北京温馨的家和亲人，独自一人随学校集体迁往河北省承德市。他在那里一呆就是七年。在那七年里，只有一年两次的寒暑假（1966年文革开始，暑假被取消）可以回家住。

上一两个月，其余时间他就一个人蜗居在校医室的值班室里。白天在里面上班，晚上就成了父亲的宿舍。房间没有暖气，承德的冬天比北京冷得多，晚上实在冻得受不了时，他只能用电炉子烧点开水，灌个暖水袋取取暖。无冬历夏，一日三餐都要跑去食堂打饭吃……这一切都是1963年冬我上北大后放第一个寒假，去承德接父亲回京时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的亲眼所见。虽然远离家人，生活艰苦，工作繁重，但是在承德和父亲一起度过的那三天，没有听到父亲一句怨言，一声叹息。他还几次用那浑厚深沉的嗓音唱起了他最喜欢的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也许他是在用歌声表达：只有加倍努力工作，把自己的一切能力和智慧贡献给人民，才是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最好报答。那个时候无论是谁做梦也不会想到有着这样一颗忠诚善良的心，对共产党充满感激和热爱之情的老知识分子，在几年后的文革中等来的竟是万劫不复的灭顶之灾！

◇ 悬壶济世 呕心沥血 救死扶伤

1949年建国前夕，为谋生，父亲在通州开了间家庭诊所，给周围百姓看病，1949年后由于当时刚刚结束战乱，整个国家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因此政策规定允许医生利用业余时间开业行医，以为国分忧。这样，父亲的诊所被批准注册继续营业。那些年，在父亲的调教下，我的大姐和做过小学老师的母亲已经可以充当护士和司药了。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大跃进时父亲将诊所的药品和医用器械全部无偿捐献给学校为止。

前面说过，父亲最擅长的是内科和小儿科，而这两科正是一般百姓最需要的，尤其是儿科。因为这一科的医生需要对患者有比其他科医生更多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要承担比其他科医生更多的风险……另外，那时医院本来就少，交通又不方便，婴幼儿发病需能就近及时得到治疗。父亲的诊所就开在人口密集的新城南街，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周围百姓，特别是小孩子看病难的问题。近十年里，父亲治愈了一个又一个患儿，挽救了许多病危儿童的生命。我清晰记得在通县新城南街34号门口竖着悬挂的那块写着李克欧（父亲的号）大夫诊所锃光瓦亮的铜牌。每天放学回家，我会看到不大的候诊室里坐满病人。父亲从学校下班回来，顾不上休息，洗洗手就开始给患者看病。他常常很晚才能吃上饭。有时半夜三更家长抱着发烧的患儿敲门来看急诊，我们都受打扰休息不好。父亲却从无怨言，在母亲去给病人开门时，他已穿好衣服在诊室里做准备了。父亲是一位宽厚慈祥且极富同情心的人，来诊所看病的常有些贫困居民，他们有时付不起药费，父亲就让先赊着，有些赊欠时间一长就不了了之了。也有的人会把家里一些不用的旧物件拿来抵药费，即使那东西我们家里并不需要，父亲也默默收下，从不计较。这让我们做子女的从小懂得了善良待人。长此以往，父亲在群众中有了很好的口碑。那时在通县城里，说起给小孩看病，没有人不知道新城南街有位名医李大夫。一些家长在自己的孩子被治好（被救活）后为了感谢父亲，也为了今后孩子活得更健康，索性就让才两三岁的孩子认父亲做干爹。以后每逢过年，家长都会带着他（她）们来给干爹拜年。在我的记忆里就有父亲的两三个干儿子干闺女直到几十年后还和我们家保持着联系。

父亲的一生在学校里工作的时间最长，说起他对学生的关爱，有一件事对我影响至深，让我终生难忘。记得是1958年夏天，一个雷鸣电闪风雨交加的夜晚，全家都已睡下，忽然，砰！砰！砰！响起一阵急促敲门声，原来是通州师范在运河东的富豪村参加夏收劳动的学生有人病了，学校来人请父亲出诊。当时父亲身体不太好（坐骨神经痛），但他老人家二话没说立刻去收拾急诊包。此刻天气很糟，而要到达目的地还需走20来里路呢！父亲一个人去谁也放心不下，于是决定由我陪他同去。我们父子走出家门大约11点多了，天下着瓢泼大雨，街上没有路灯，周围一片漆黑。父亲打着伞，我搀扶着父亲，借着忽明忽暗转瞬即逝的闪电踟蹰前行。经过中山街时路上积水已没过脚踝，而雨却越下越大，还不时响起震耳的雷声。父亲为消除我这个14岁少年心中的恐惧，给我讲起了他小时候陪爷爷出门的一段

往事……走出县城，乡下坑坑洼洼的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更难走了。我们只能互相搀扶着摸索向前，就这样，约凌晨3点才到达学生住地，此时雨虽停了但我和父亲早已浑身湿透。当父亲问起病号的住处和情况时，一位带队老师说，学生已经睡了，等天亮了再去看吧。于是我随便擦了擦身，便一头倒在老乡的土炕上睡了。旭日临窗我才醒来，发现父亲已经给学生看病回来了。只见他双眼布满血丝，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许多。这件事让我后来懂得了什么叫爱岗敬业，什么叫爱学生。在我后来30多年的教师生涯中一直以此为样板呵护关爱自己的学生，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我就荣获了湖南省优秀教师的称号……

◇ 文革浩劫 惨遭涂炭 尸骨无存 死不瞑目

十年文革是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场空前规模的浩劫，而运动初期以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打死及大兴县集体屠杀“四类分子”计算，这场疯狂杀戮从1966年8月初开始，延续了两年的时间。全国许多地方没能幸免，尤其是大中学校普遍发生了对教育工作者及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的暴力攻击。一开始父亲对这场运动还抱着善良的愿望和天真的幻想，在1966年8月7号父亲写给我的信中谈到学校的情况是这样说的：“我校运动四清与文革同时并举，我在年老薪高之内当然得被扫一下。所贴大字报多属态度问题，这与平时工作讲规章制度，不能尽如人意有关。自己多是生硬简单，未能做到热情细致，也是诚然。故今后处事对热情细致这点还要好好努力。其他虽有些事，但贴者多从恩怨出发，不符合实际，将来自有结论，所以自己也就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之，精神上倒无何负担。现阶段还是大揭发、大议、大字报阶段（已二月余多）以领导的最多，其次如中层领导和语文政治教员的为多。不知这一阶段如何结束，下一段是什么？我个人正在交代历史阶段，因为过去事实均已填齐，但远年的时日，有些填错，这次也加以更正。现在是不上课（已二月多了），学生老师每日学习议论八个小时，星期日多半能休息，洗洗衣服等。……听说运动可能搞到年底。今日星期，上午休息，下午五时后到外边听报告，抽暇书此即问进步。学校革委会已成立。父字 66·8·7·早”（见文末附录二）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封信竟成了父亲给我的绝笔！（收到信后仅二十天父亲已在承德死于非命）。到了8月中旬，承师学校里便有人向学生公布了李的档案，于是一大堆莫须有的、完全是凭空杜撰出来的罪名铺天盖地而来。什么李志光是C·C特务，中统、军统特务，有手枪、电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父亲的那台伴随他一个人度过寂寞时光的半导体收音机硬说成是电台）。甚至把1960年大饥荒时一个夜间在医务室值班的学生因饥饿难忍将储物柜里的毒鼠药当成食品误食而死亡和另一个女生裴景琴深夜在宿舍里因心脏病突发心肌梗塞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说成是李志光有两条人命。

在那种指鹿为马、黑白颠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红色恐怖”日子里，父亲很快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正值三伏，他被关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炎热和饥渴折磨着他，连大小便都被限制外出。到了九月一号，在8·18、8·31受毛泽东两次接见后，带着伟大领袖“要武嘛”的最高指示的北京红卫兵窜到承德师专后，要求批斗挨揪的当权派和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有当时的党委书记苏仁，以及若干名有所谓家庭政治历史问题的教职员，包括李志光、睢文龙、刘振先、曹本平等，而承德师专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王兴文更是借助北京红卫兵的这股妖风，与他们串通一气，用上面那些耸人听闻的罪名，对李志光大搞刑讯逼供，用非人的手段折磨他，要他承认是特务，要他交代同伙、联系人，但李志光宁可自己被冤屈，宁可自己承受巨大的痛苦，却至死不肯诬陷别人。最后在极度疼痛难忍时他说出了几个“同伙”的名字，然而王兴文等人一查档案发现全是父亲年轻时行医自己用过的号和别名。酷刑拷打在继续，当时在场的陪斗者后来叙述说：“这些同志给叫到北院教学楼后大杨树底下，被命令脱去上衣，四肢趴在地上。之后这些坏分子（指当时校内外的红卫兵）就用铁丝向每个人身上抽打，打得皮开肉绽，往外流血，打完李大夫，又有坏人说他是国民

党特务。据传北京的联动分子又在李大夫身上用脚踩，叫做‘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其后命令他往楼后爬，在爬的过程中，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致死”。〔2〕这里的血腥场面完全符合一位研究文革受难者问题的权威人士分析的“1966年杀戮的主要特点是，被害者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官方文字记录留下；他们不是由专业刽子手枪毙或者杀头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杀主要由中学生红卫兵执行的。十多岁的青少年当时有权对人施行酷刑、剥夺财产住房，直至杀死人。”

除去前面引用的那位陪斗的付老师提供的令人发指的证言外，还有一个1967年我去承德收拾父亲遗物时听到当时在批斗现场的一位教工对我讲述的更让人心碎的细节：就在父亲被抽打蹂躏折磨得快要咽气时，一个本校了解父亲家庭情况的红卫兵竟然对着父亲大声说道：李志光，你抬头看看，你家里人来看你了！这时趴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离死亡只有一步的父亲竟然像被注射了强心针一样，用力抬起了虚弱的头向四处张望。他多么希望咽气之前能看一看他曾深爱的妻子儿女，多么希望自己养育过的那么多儿女能把他从死亡线上救回来啊！可是他没有看到一个亲人的影子，这时传来红卫兵们一阵疯狂的狞笑，紧接着父亲身上又落下一阵棍棒、皮带和皮靴……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悲惨地死去了。当时我听到这里真如万箭穿心啊！我的父亲李志光他死不瞑目啊！关于这个细节，迄今为止我没有敢告诉家里的任何亲人，因为我怕他（她）们受不了这种可能让人发疯的刺激！如果不是《回顾暴风雨年代》给了我这样一个倾诉的机会，我也许只能永远把它烂在自己的肚子里了。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没能过上几天不愁温饱又无忧无虑的日子，最后却带着满身的鲜血、伤残、剧痛，拖着已被折磨得崩溃了的神经，心中怀着天大的冤屈，走了……

父亲咽气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在得到消息，子女们从遥远的外地赶到承德时，他早已被草草埋葬在荒山野岭中了。十三年后的1979年，当父亲的冤案平反昭雪时，家人连他的一根尸骨都没有找到，以致他的骨灰盒里放的只有从当年埋葬父亲的荒山野岭中取回的一抔黄土和他生前穿过的一套旧衣服烧成的灰！父亲撒手人寰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可是50多年里父亲惨死的场面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对着茫茫太空大声呼喊，苍天啊，请告诉我，我的父亲在哪里？！我要找他回家啊！……

父亲走后有一件让我悔恨终生的事。1967年学校通知我们去承德取回李志光的遗物，当时父亲的书信和日记（父亲有写日记的习惯）本来也可以拿回来，可是自己那时竟幼稚地认为，这些东西留在学校将来对证明父亲无罪会更加有用，就没有拿而是要求学校代为保管，只拿回了那部被证明不是电台的黄河牌半导体收音机（因为我们知道平时父亲日记里记得多是工作上或与家庭、教育子女有关的事情，不会有任何所谓反动的内容，是将来说明他的清白的有力证明）。万万没想到的是，到1979年我们得到通知去承德为父亲平反昭雪时，学校竟告诉我们，李志光的书信日记全部遗失了！让人愤怒不已，曾经希望通过在承德日报刊登寻物启事进行找寻，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实施。几十年来我一直无法原谅自己当年的幼稚想法和愚蠢决定！深深的自责一直在折磨着我！

◇ 如山的父爱永在心怀

父亲一生为人忠厚、不善言辞。对子女的管教和爱，总是在身教重于言教的润物无声中影响着我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常从大处着眼（鼓励我们努力学习，督促我们追求进步），又常从小处入手，对一些看似小节的事从不马虎。印象中，父亲给任何人写信，不管信长信短，都字迹清晰工整，从不潦草，有的甚至像书法作品一样充满美感，也显示出他对人的尊重。印象更深的是，自1959年父亲独自一人随学校迁往承德后就和我们就有了较多的书信往来，一直持续到1966年8月戛然而止。父亲那时给我们的信，长的有三四页，短的

则是一张明信片。1962年我上大学后，父亲每个月都会准时给我寄生活费，并在那一张张汇款单上一指多宽的简短附言栏里工工整整地写满密密麻麻米粒般大小的钢笔字（这些小小的附言条至今我还保留着好多张）。这些信和附言不论长短，关心的都是我们的身体、学习和思想进步、靠拢组织，要求我们生活勤俭、热爱劳动，照顾好孤独一人在家的妈妈……更难忘的是，在父子的通信过程中父亲又几乎成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对我信中出现的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等问题，从来都是有错必纠。正是在父亲的高标准要求下，让我这个学理工的人对文字的驾驭和做事的细心认真方面有了很大的长进，以致后来无论自己写科研论文还是给书刊投稿，不管是手写还是键盘输入，字字句句都会反复揣摩斟酌再三，待送到编辑校审时经常几乎是一字不改就给发表了。

转眼父亲离去五十多年了，唯一让我稍感欣慰的是，无论自己下农场、进工厂、还是离开工厂调到高校，无论南下北上还是北上再南下，无数次的迁徙搬家，丢掉了多少瓶瓶罐罐行李家具，但父亲生前写给我的几十封信，和我一起拍过的不多的几张照片我都精心地保存下来了。如今，它们成了我和父亲在梦中相会的一块永远的绿茵。在那里，我听到了父亲谆谆的叮嘱，感受到温暖我心的如山的父爱……。而痛心遗憾的是，那些年我写给父亲的几十封信，全都和父亲的躯体与生命一样，在那万劫不复的年代消失得无影无踪……

亲爱的父亲：您以自己的崇高精神和伟大人格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丰碑！向您这样具有宽厚胸怀，充满博爱精神的人是永远不会死的！您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壮哉，父亲！您虽未留下骨灰，但却给我们留下了骨气！留下了无数的精神财富！无论您是在九泉下还是神游在太空，您一定会扬眉吐气！时间永远是最公正的裁判，历史最终要将那些涂炭人民的刽子手钉死在耻辱柱上！如果有人问我，今生最大的悔恨和永远的遗憾是什么，我会斩钉截铁地说那就是：恨自己1966年没有从魔鬼的铁蹄下把父亲救出来或用自己的死去换来父亲的生，做儿子的有愧啊！如果有人问我，今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会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还有来世，我还要做李志光忠实孝顺的好儿子，您还是我最敬仰最伟大的父亲！也许惟如此，才能把我从今生今世最大的悔恨和永远的遗憾中拯救出来。

◇ 文革的覆辙绝不能重蹈

党对十年文革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由于种种原因，如今的许多年青人对中国几百年上千年的唐宋元明清和1949年前的抗战、内战史多少还有些了解，但对刚刚过去几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却知之甚少，甚至一团模糊。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忧心的事。现在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居然想利用年轻人对文革的无知，妄图把这样一场历时十年的浩劫美化成是所谓的“革命探索”，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我想，任何一个有正常人的感情和思维认知能力的人，在看完李志光这样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一个善良单纯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后，都应该能够对文革究竟是一场浩劫还是一次“革命探索”作出正确的判断。笔者之所以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重新揭开心中远未愈合的刀口，忍住眼中的泪水，用颤抖的双手在痛苦的回忆中挣扎着敲出这篇文章，是想让它作为一扇小小的窗口，请读者透过这扇窗，看看文革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趁着一些文革的亲历者、知情人还活着（许多人已经走了），如果他（她）们能够对自己曾经经历或知道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许许多多人的悲惨命运如实揭示，对文革中，国家文化与生产

力遭受的极大破坏真实曝光，相信我们的年青一代一定会擦亮眼睛，认清真相。一小撮别有用心企图为文革翻案的人一定无法得逞。我们的党和人民决不会也决不允许让“文革”这样的悲剧重演！

2018年11月4日

注释：

1. 该校校名几十年来多次变更，现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2. 摘自李志光遇害时旁观人付老师证言信。

（作者简介：李国治：男，1944年生于北京，籍贯河北唐山。1962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1968年12月毕业到军垦农场劳动锻炼。2016年7月正式退休。）

附录一：中共承德师范学校委员会关于李志光同志死亡的结论

李志光同志于1949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历任：通州师范学校校医、承德师范学校校医、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李志光同志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曾把自己的医疗器械献给了学校。注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能够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积极钻研医疗技术，积极组织培养学生卫生员，注意宣传防治、保健卫生知识，热心为师生员工、家属看病。下乡为贫下中农治病并受到称赞。能够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纪律。在患肝炎病期间，也能坚持工作。能够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并能帮助同志提高业务技术。生活简朴，作风正派，能够严格要求家属及子女要听党的话，努力工作。

李志光同志于1966年九月一日，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被迫害致死。根据党的有关政策精神，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强加在李志光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有关抚恤和供养遗属待遇，执行因公死亡有关规定。

中共承德师范学校委员会（章）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录二：父亲的信

国治我儿见字：我一定遇事多向主席著作请教，望你勿念。

来信收到了，知道你们又迁回本校。校园售品部无售凉席是否？今年贱，铺它可省褥单。我从这买才花1·3元，单人细席，成色不坏。我校运动四清与文革同时并举，我在年老薪高之内当然得被扫一下。所贴大字报多属态度问题，这与平时工作讲规章制度，不能尽如人意有关。自己多是生硬简单，未能做到热情细致，也是诚然。故今后处事对热情细致这点还要好好努力。其他虽有些事，但贴者多从恩怨出发，不符合实际，将来自有结论，所以自己也就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之，精神上到无何负担。现阶段还是大揭发、大议、大字报阶段（已二月余多）以领导的最多，其次如中层领导和语文政治教员的为多。不知这一阶段如何结束，下一段是什么？我个人正在交代历史阶段，因为过去事实均已填齐，但远年的时日，有些填错，这次也加以更正。现在是不上课（已二月多了），学生老师每日学习议论八个小时，星期日多半能休息，洗洗衣服等。国友前者来信，说他校文革运动经过，好像还没什么大问题，说暑假后要下去四清，走以前也许休假几天回家看看，他也游泳并准备听国家召唤去抗美援朝。从四清以来，我校伙食饭菜日贱，且好，菜5分—2角一个满好，因此在生活上比过去省多了。我每日生活非常规律，因为脑中总有事，所以想家的心也就挤没

了。听说运动可能搞到年底。今日星期，上午休息，下午五时后到外边听报告，抽暇书此即问进步。 学校革委会已成立。 父字

66 • 8 • 7 • 早

□ 原载：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9年3月

~~~~~

## 【人物追踪】

### 潘复生晚年一席谈

• 赵宗礼 •

32年前，潘复生在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招待所接受“监护审查”期间，现《南阳日报》社印刷厂厂长陈连兴（现年60岁），有幸拜访了他，并与其畅谈。陈连兴通过仔细认真回忆告诉我，这位曾当了多年河南和黑龙江两个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政委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的潘复生，晚年的日子竟十分悲凉，当时充满着无限感慨、无奈、忧怨和悲伤。因为潘复生在河南60岁以上的老人们的心目中公认为“河南最好的省委书记”，一直受到河南人民的怀念和尊敬，所以才促成了此“访谈篇”的产生。

1978年隆冬，时为济南军区陆军78师某部正连职干部的陈连兴，奉命来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亚麻纺织厂，协调师营房科一位姓牛的军转干部的安置问题，住进了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招待所。闲聊中获悉“文革”中因支持“造反派”犯了“左”的错误的潘复生，就住在本楼二或三楼的一个小套间里，接受着组织上的“监护审查”，由6位着便装人员轮流看管着。陈连兴8岁时正赶上河南省委掀起的“大批右倾机会主义潘复生、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的群众运动”，潘复生在当时的河南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只是“大批”却把“潘复生批香”了，孩提时代的陈连兴就从父辈那里知道，潘复生才真正是建国后最好的一任省委第一书记。他在合作化运动高潮时的“反冒进”，搞“大社化小社”、“主张退社自由”、“牲畜分槽喂养”、“增加自留地”等“求是”举措，把当时正刮起的“左倾冒进”、“左倾蛮干”所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批潘”以后河南出现了大饥荒，其间陈连兴亲眼目睹了“左”祸给家乡人民造成的饿殍遍野惨状，陈连兴自己也差点儿饿死。孩提和青少年时期的陈连兴听到父老乡亲们经常念叨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是潘复生还是咱们省委第一书记的话，不至于饿到那种“人吃人”的程度。河南老一代人对潘复生的怀念和尊重是一致的，是发自内心的。陈连兴希望目睹一下潘复生这位高干的风采，更想和他攀谈一阵子，以便有朝一日回家乡时向父老乡亲们炫耀此事。在几句美言征得看管的同意后，陈连兴便来到潘复生住处，见到了时年已70岁的潘复生。当陈连兴向他自报家门，作了一番简要介绍，特别是表达了自小对潘复生的敬重之情后，这位当时虽然政治上已经潦倒，但依然是6级干部的潘复生，竟与正连职小军官一见如故似地畅谈起来。

潘复生说，我坐国民党监狱时，对自己为什么坐监，为什么遭受酷刑心如明镜。可解放后在组织领导河南、黑龙江两省政治运动和经济建工作中，一会儿说我“右”了，一会儿又说“左”了，始终弄不明白。1958年7月河南批我时说“散布阶段斗争熄灭论”呀，“生产悲观论”呀，“包庇右派，破坏反右斗争”呀！还有什么在合作化问题的“反冒进”、“大社化小社”、“牲口分槽”喂养什么的，依我看是我一心想把河南各项工作搞好必须要说的话，要办的事。譬如当时河南省委常委会中的多数人，为了从农民口粮中多挤出一部分粮食充当征购任务，竟提出了3斤鲜红薯即可折合成1斤原粮（当时粮食卖给国家，留给农民的口粮是红薯）。而我和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竭力反对，我俩坚持认为5斤鲜



红薯才能折合成1斤原粮。可是这件事后来就成了吴芝圃等人说我们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只顾农民群众，不顾国家利益，犯了“右倾错误”的一大罪状。说实在的，我在河南工作期间，在粮食问题上可能就有点“保守”。这是因为，当时的河南确实地瘠民贫，生产条件低下，连年受灾，征购任务却很繁重，以至于缺粮情况相当严重。我记得可能是1957年春上吧，为解决河南的粮荒问题，我年初就派人调查摸底，及早动手向粮食部写报告，国家才从湖北等省调来大量的粮食，及时预防和避免了大面积的饥荒。如果当时就全部按有的人“左”的那一套搞法，说不定1957年春就出大问题，更不用说1958年夏、秋两季的大丰收了。可是当时连中央也说我“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批斗一阵子后撤职不说，还下放到西华农场劳动改造达三年半之久。

潘复生说，1966年元月中央派我到黑龙江省委主持工作后，我整天想着一定要谨记在河南工作时的教训，千万不能再犯“右倾”错误了，一定要紧跟毛主席。谁知这次紧跟的结果，却犯了“左”的错误。我到黑龙江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曾有一大阵子“造反派”把我当“走资派”批斗，每次遭批斗都是戴高帽子、打花脸受尽折磨。挨斗之后，我都是把高帽子一摘，花脸一洗净，又挺起腰杆千方百计去抓工作去了，总是竭尽全力想把“文革”大乱后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我当时这种积极站在群众运动前列的举动，还受到毛主席表扬呢！至于后来黑龙江省发生的两次较大的武斗事件，还有后来乱揪斗老干部的事，我应负制止不力的领导责任，但说我幕后操纵或唆使授意的，这的确是冤枉无辜。我是入党40多年的老党员，又是省委、省军区一把手，以至沈阳军区政委，无论怎么说也不会如此下作。但组织上却以这两次事件为主要罪名把我软禁起来，对我做出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多年来我一直是享受“五员”（秘书员、警卫员、卫生员、炊事员、保姆员）的6级高干，现在没有一员不说，还失去了人身自由。本人即是到商店买牙膏、牙刷生活必需品类的小事，也得先向看管人员提出，经批准后在有人陪同监护的情况下，才能允许前往，甚至连在院里随便散步之类的单独活动的自由都没有。不仅如此，还株连亲人一大片。清明节时，我要求回山东泰安给我老岳母扫墓，组织上给的钱只够到泰安的往返路费，想多领一点就不给，我们连花自己工资钱的自由都没有了。前不久，我老伴亡故，如今我可以说是孑然一身。我儿子从北京地质大学本科毕业后，由于我的影响，工作安排得很不理想，在广东以至于找个合适的对象都很难，已经快40岁的人了，却未能成家。据陈连兴仔细回忆，潘复生讲到老伴、儿子受株连的遭遇时，眼睛里充满着极度的无奈、感慨、忧伤和悲凉。

据陈连兴当时的印象，潘复生的个头大约在1.72米左右，属于中等身材，微长方形面目，只是有点消瘦，当时体重顶多在100市斤上下。他身着一身灰色中山装，床上的被子好像是浅绿色的。头发花白，当以白发居多。两眼炯炯有神，看人很慈祥，谈吐举止颇有文人雅士的风度。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孤苦伶仃地住在招待所的一个小套间里，正可谓风烛残年，形影相吊。简陋的住室里除了牙膏、牙刷、毛巾、衣服外，就是一个14寸的天津产的“北京牌”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和一套大字版的《毛泽东选集》了。由于潘复生的眼睛不好，即使看这大字号的“毛选”也得使用放大镜，所以桌子旁边还特意放置了放大镜，供他学习和写字时使用。

潘复生对陈连兴说，软禁以来，这套《毛泽东选集》他也不知道反复阅读了多少遍，但是越看越对自己几十年来一会儿犯“右倾”，一会犯“左倾”错误的原因越弄不明白。是毛主席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又那样说的话把我给弄糊涂了。在河南主政时对毛主席有些指示稍加迟疑和因地制宜，便说我“右”了；在黑龙江主政时唯毛主席的话是听，千方百计“紧跟”，又说“左”了。真是“右”也不是，“左”也不是，无所适从。始终弄不明白。开饭的时候到了，陈连兴陪着潘复生一起来到了一楼餐厅，排队各打了一份水饺。当水饺打到各自的饭碗后，年纪不到30岁的陈吃着都嫌凉，而潘复生同志又端着到楼上自己的软禁室吃了。事后我问他，他说配点开水可以吃。他屋里的暖气似乎也没有陈连兴们住的标间热，是

他自己不要那么热？还是别人故意使坏，不给他供那么热？陈连兴没有问，此事更增加了陈连兴对潘复生的怜悯之情。

根据陈连兴的回忆，当时的潘复生也是企盼中央对自己的问题早一点做出结论，尽快获得“解放”，以便能够安度晚年。他还特别提到他在河南的“难兄难弟”杨珏、王庭栋二人。他对陈连兴说，我在河南“犯右倾错误”时，杨、王他俩和我一案。文化大革命中他俩也和我一样犯了“左”的错误，可杨、王二人早获得了解放，且已恢复原职。文化大革命犯了“左”的错误的省委书记们，也都获得了“解放”，现在被“监护审查”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人了。为了获得“解放”，前段我曾把自己申辩材料托人已转到了叶帅手里，帮忙者说，叶帅也随即转给了华国锋，华主席也转到了中组部，是中组部搁了浅。（潘复生认为，很可能是时任中组部长宋任穷不同意，黑龙江省的“造反派”“文革”时整宋任穷等人整得很厉害，宋任穷可能误认为是潘复生幕后唆使。这或许只是潘复生个人的乱加猜揣？或许事出有因？或许确有此事？对此这里只能存疑了）。潘复生最后说，我相信组织相信党，坚信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水落石出的。

潘复生说的没错，1982年4月，中共中央对潘复生的政治问题做出结论，同意黑龙江省委对潘复生的审查结论；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不作组织处理。遗憾的是潘复生竟没等到这一天，1980年4月潘复生病故。

#### ◇ 相关背景材料——32年前河南人反对“批潘”言论种种

1958年7月到1959年元月间，以吴芝圃为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加批判，同时大抓“小潘杨王”。其间，仅以南阳地区为例，就有9249个说实话的公职人员，3万多平民遭到批判或斗争（1959年元月30日反右斗争总结报告表13）。然而，即使在这种高度的“言论专政”的高压之下，河南各地私下里仍是一片“拥护潘、杨、王”的正义声音。

南阳地委1958年9月7日给河南省委写的“我区以反潘、杨、王反动言论为中心的整风运动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称：“这次批判潘、杨、王斗争阻力确实很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动言论在各个方面都有市场，有的人甚至公开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反对我们对潘复生等人的斗争。如南阳县就有个富裕中农说，谁想叫我说潘复生不好，除非把我杀了。泌阳县也有人说这样的话。新野县有个富裕中农串联5个乡200多个农民群众到乡政府，企图干扰，阻挠批判潘、杨、王大会的召开。据淅川县的调查统计，地富反坏分子19600多人中，因拥护潘、杨、王观点需要斗争733人；富裕中农33110人中，因拥护潘、杨、王论点需要辩论930人；145482个贫下中农社员中，因拥护潘复生论点忘本变质应辩论的641人；7959个队长以上干部中，因资本主义思想严重，拥护潘、杨、王论点，抵制党的政策的就有65人。据内乡县对1636名教师调查，有严重潘、杨、王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应当辩论的59人，应当再划为右派的26人。据南阳中心支行的调查，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应当斗争的6人，占机关干部总数的6%。

1958年9月1日邓县县委整风办公室写的“全民揭发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杨、王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总结报告”说：“据对邓县二初中26位教师的思想调查，其中有23人就赞同潘复生说法和作法。如教师李天道说：‘合作化清是逼出来的，潘复生说的没错！’据统计，全县暴露出赞同潘复生论点的有15·1万多人，共暴露出不同意见557651条”。

相当一些人对潘复生的一些论点，公然表示赞同。如在对待“阶级斗争熄灭论”上，有的人就是认为当前不能再抓阶级斗争。县医院老中医芦良才说：“凡是参加了革命工作的人，都是一心一意地干，在革命阵营内部哪还有阶级敌人？依我看，对每个同志不管成分好坏和历史问题大小，都应该一律看待。”县工业局干部郭天信还说：“合作化后地主、富农都入社成为社员。机关通过肃反，农村经过镇反，哪里还有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谁有现行活动抓谁整谁才对。”林扒小学教师贾荣说：“土地法上有明文规定，不满18岁的儿童不能当地主看待，既然如此，为啥现在各学校还在贯彻阶级政策呢？”该校另一位教师杜显说：“去年在教师队伍中划右派是多此一举，知识分子没啥可反，过去有句俗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都是小秀才，造不了反。”王沟教师张德说：“我认为大右派是客观存在，本质决定；小右派是心直口快，是吃嘴上亏了。”在粮食问题上，大部分干部和教师更拥护潘复生的观点，认为口粮留量就是偏低、偏少，确实不够吃。教师李富堂说：“如果说粮食问题不是主要矛盾的话，为啥现在家家户户到处都在议论粮食问题呢？”桑庄教师腰保明说：“农民大干一冬，苦干一春，麦忙天吃的稀溜溜，饿的脸皮消瘦，咋干重活？”林扒教师李三刚说：“原来党宣传说，开荒三年不交粮，说是既利国又利民。现在为啥连自留地也收走了。”教师张修堂说：“‘双统’不自由，吃的稀溜溜，每人每天不顶一斤粮，食堂改成每天只两顿饭。光说粮食政策好，就是吃不饱，打死也不说好！打死也不说潘复生坏！”教师邵荣申说：“潘复生说‘双统’好像一根绳子拴在农民脖子上，这话真是不假，就是粮食指标太低，吃不饱，卡的死。”县医院干部杨荣保说：“粮食问题不能用回忆对比的方法来认识，一对比就明显发现，现在吃的粮食远不如过去。”县银行干部陈效文说：“今年夏季丰收了，可粮食留量还是那么少？拿着钱到市场上也买不到一点吃的。”在对待潘复生等人提出的“大社分小社”问题上，有不少人也提出了支持潘复生的看法。县人委会吕吉乐说：“我看小农经济能促进经济发展，一家一户弟兄们多了，如果不分家都比着不干，而分家以后就立即各为其家大干了，庄稼比着种的好。农业社我想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潘复生的大社划小社就是能促进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县人委会干部王宗本说：“实现农业机械化没有合作化的基础我看也可以，人家美国不就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了机械化了么？”县公安局干部王九如说：“我看小农经济就是好，要说的话，今年夏季的小麦为啥增产了？”教师李振安说：“潘复生提出的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这才真符合共产党说的大仁寓于礼义的说法。”教师张惠芳说：“合作化后就是不自由，人力代替大黄牛，拉犁拉耙的是剪发头，潘复生说得不错。咱们谁敢说，说了、辩论你！”张村教师江心珠说：“有史以来都是男管吃，女管穿，现在男女不分都叫下地劳动，这咋能算合作化优越吗？”在增加自留地和“开放自由市场”方面，也有人表示出了对潘复生的论点的赞同。县三中教导主任李耀华说：“多分自留地，就是能刺激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要不社员们为啥不休息，没明没夜地去到自留地里干活呢？”县医院干部王荣芝说：“扩大了自留地，多打了粮食，虽说是社员个人的，但还不是我们国家的？再说了，社员们都有吃的了，也就少给国家找麻烦了。”教师赵琢义说：“潘复生叫多分自留地是关心农民的具体表现，如果说自留地不好，为啥苏联现在还有？为啥中央就没让取消呢？”不少人都认为“十项布告”、“开放自由市场”的作法符合社会主义规律，符合群众要求，是得民心之举。县医院干部王崇信说：“市场自由开放多好，到街上想吃啥买啥吃，现在啥也没有，拿着钱花不出去。”教师郭志荣说：“如果没有自由市场调剂，群众遇到天灾人祸时怎么办呢？”“个别人用讽刺挖苦来抵制批潘复生运动。林扒中学教师黄建训在自家的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潘复生太右了，吴芝圃太左了。’门头横额是‘省委失衡’。新铺完小教师杨子富说：‘我原来认为共产党怪好，从对潘复生没事找事上来看，我看共产党扯淡。’”保宁小学教师海光照说：“我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一切事物，用此一分析就把地主们分析得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教师孙海周说：“合作化啥自愿不自愿？清是逼出来的，‘双统’是靠逮捕人完成任务的！”县商业局干部吕善富说：“潘复生说河南特殊就是不假，陕西省去年人均免购点500多斤，而河南仅360斤。”教师孙敬宇说：“啥合作化是条幸福路，依我看入社后是叫群众活受罪的。”批判潘复生以来，邓县全县已收回自留地68928亩，耕牛2663头，驴马30

06头，猪羊8886头（只）。不少富裕中农把已退出来的东西送回社里，当前，有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仍然有抵触情绪，有的人恐慌不安，怕被辩论或斗争。如构林乡富裕中农袁明堂说：“讨论时说的再好我也不相信，因为粮食不够吃是铁的事实，潘复生的话没错！”杨林乡富裕中农王风德说：“潘复生犯法，群众没犯法，为啥没收俺们的自留地？”歪子社支书赵朝文说：“牲口分槽喂养咋能算错？咱们社的牲口要不是分散分槽喂养早就死光了。”批潘“高潮时，方城县独树公社有个农民在几个大南瓜上刻了”纪念潘复生“，”拥护潘、杨、王“等几行大字，有人借此事汇报地委、请示咋办，地委也不了了之。可见当时南阳上下明的暗的都是抵制”批判潘复生“运动的。

来源：《炎黄春秋》2011年01期

~~~~~

【劫后反思】

以忏悔唤回人性良知（下）
——樊思清从犯罪到忏悔的心路历程访谈录

• 樊思清 • 孙怒涛 • 孙毓星 •

（上接 z k 1 9 0 7 c）

五、留校改造

▲ 孙：7·27工宣队进校，清华武斗被制止了，大礼堂这个据点的解决好像比较平和？

▲ 樊：是的。大礼堂里有武器，有食品，有制高点，是团派最坚固的据点之一。要是工宣队强攻，我们只要把大礼堂的大门、边门关闭，很难攻破，双方也会有很大的伤亡。但因为我这一枪，大家看到一个好端端的活人被打死了，这恐怖和血腥对大家是个极大的刺激和惊醒。当工宣队要进大礼堂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抵抗。我把东边门打开，让他们进来。他们问我武器藏在哪儿，我如实交代，武器被他们收走了。大礼堂据点的和平解决，解除了团派对科学馆的包围，对解救科学馆的被困人员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 孙：此后你个人的情况有什么变化？

▲ 樊：7·27那天，进入大礼堂的工宣队员曾对我盘问。他们当时关心的是武器，没问我武斗中有没有打死人这样的问题，我当然也不会自己去捅这个问题。但我明白，我的问题是明摆着的，工宣队迟早会来找我算账，我就在8月8日主动找工宣队坦白了我在武斗中打死人的罪行。此后，表面看，我与其他同学一样，但在实质上，我是被专案组管辖的人，与其他人不一样。他们是消除派性、斗私批修的问题，而我则要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坦白杀人的罪行。

工宣队进校以后搞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我都参加了，接受教育。高年级分批毕业了，到1970年，最后两届（0字班和00字班）也要分配了。这两届毕业生中，有800名留校了，身份是“新工人”。我作为有问题的人也留校了，但那是留校改造。

从工宣队进校以后直到我在1973年被拘捕的留校改造期间，是我最感到黑暗和绝望的日子，情绪极其低落，比在监狱里服刑更痛苦。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简单的案情被反反复复审讯交代了无数次，见不到结案；知道必被法办但不知道怎么办我；见到的都是阴沉的脸；经常被拉去批判，之后被人冷漠。这样的长期羁押比无期徒刑

刑还遥遥无期。说是留校改造，但无论怎样改造，还是看不到一点前途。监狱里表现好还可以减刑，留校改造则是无期限的羁押。想起这种批斗会何时可以结束？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回家以后如何面对家人？想起回家以后还要到居民委员会去报到汇报思想，经常会受到群众的监督改造。想起过去右派分子的种种不幸的遭遇，我不寒而栗，常连续几次晚失眠。

▲ 孙：后来你也到鲤鱼洲农场去了？

▲ 樊：1970年年中，江西鲤鱼洲农场正式开张。这是改造臭老九的地方。教师首当其冲，有些新工人也去了。我是以留校改造的身份被押着去“战天斗地，劳动改造”的。火车经过武汉的时候也不让我回家看一看。

电01班的陈贯良同学与我同车抵达农场。我们俩都身强力壮，挑砖时比谁挑得多。一般老师使用竹子扁担，我们俩都使用加强木扁担（扁担上用十号铁丝帮了补强条）。挖沟时我的锹切下去可以挑起来完整的35长×25宽×20厚的长方形泥块。在鲤鱼洲期间，比起60岁的清华教授，我一直没有感觉身体受累，思想上想的是：“死？死不了，恐怕要在这里干20年”。

陈贯良是新工人，我是留校改造的。我们俩刚刚到达鲤鱼洲时他对我很客气，就和以前老团战友在百日武斗中遇见时一样笑容满面。7·27以来有这么一个人对我有笑容，就像兄弟一样，我感觉很奢侈。

▲ 孙：在《历史拒绝遗忘》这部文集中，有一篇侯国屏写的文章是纪念陈贯良的。他在清查516运动中自杀了。

▲ 樊：是的。全农场开大会清查516分子，要求有问题的人都站起来。就是在大家大喊“陶德坚！站起来！”的那一次大会上，我也站起来了。第二天再碰见陈贯良，他对我突然严肃万分，表情跟面对敌人一样的凶和狠。我想他过去可能误认为我也是新工人，后来才知道我是阶级敌人。他的阶级感情真鲜明啊！又过了几天我听说他钻入在大堤上行走的拖拉机自杀了！我顿时流泪了，有失去兄弟之感！都是在孤岛上亡命天涯的人啊！

后来我想，不是他太脆弱，也不是我的脸皮比他厚，是因为我确实有罪应该站起来。人的“情绪耐力”也需经锤炼。在之前我曾接受过一次更大的“锻炼”——那是在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公判大会上，遇罗克被执行死刑，我被押送到开会现场接受教育。正当要被枪毙的反革命份子被押送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中央时，我被同班同学指名道姓喊着：“樊思清！你站起来！看看他们反革命的下场！”。这是多大的场面啊！那么多双眼睛突然盯着我，激得我心惊肉跳头发竖立。经过这一次以后，再听见被批判的声音，精神和肉体上的反应就大幅度钝化了。

在心情最恶劣的时候，我曾有过自残自杀的念头。陈贯良同学的自杀提醒了我，促使我去想为什么要去死呢？他死了，并没有人同情，农场批判揭发516的运动照样搞得轰轰烈烈。自杀了，也没有人说他好，反而要把他批判一通。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见不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了。他一点罪错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就死了。而我是负有命案的人，如果就这样去死也只是臭狗屎一堆！不管怎么样别人也没有要你直接就去死。活着总是有希望的。最起码能够见到父母和兄弟姐妹。所以他的死，让我从根本上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 孙：看来没经历过这种阵势突然受到意外的打击精神容易垮。陈贯良死得那么决绝，真的可惜了！

鲤鱼洲农场的生活很艰苦吧？

▲ 樊：在鲤鱼洲，我被分配在三连二排四班，和林兆庄，徐秀清，容文盛，林浩，方崇智，路霁鸣等一起干活。

有一次我们在大堤堤顶上垒石头加固堤防，路旁一不留神，把一块（50×30×30公分）的石块扒开，滚到下面2米远处的我面前。说时迟那时快，我两腿分叉一跳，石头从我的两腿之间掠过，一直滚到堤下。徐秀清老师看见了这一幕，倒吸了一口凉气。第二天出工强调了安全生产，还对我表扬了一次。对于罕见的表扬我在内心非常感激。其实在我心中我对徐秀清老师一直倍加尊重。林兆庄，徐秀清，容文盛（学生辅导员）几位老师政策水平都比较高，在劳动和生活中，他们的言谈举止对我的思想颇有启发和感染，对我这个犯罪的青年学生也采取了比较耐心善意的批评教育，受益匪浅。

我们下水田以前为预防血吸虫的尾蚴钻进人体，用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或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擦在腿上形成薄膜。水稻插秧、耘田、收割，每人平均六列。我的右边是林浩，左边是方崇智，三个人管十八列水稻。他们都是60岁左右的清华著名教授啊！有时我看到他们体力不济，就一个人管八列，他们每人五列。三个人心照不宣，守口如瓶。两个老教授回清华以后，分别遇见过我，都在私下鼓励我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一定会有解决问题的那一天。

在鲤鱼洲我和上百位清华北大的名教授，有些是非常有名的顶级教授，几千名优秀中青年教师24小时不分昼夜地生活劳动在一起，不但使我感觉不孤单（老实说这对他们是极不公平的），而且一直是我日后对外吹牛的素材。我一直就崇拜和喜欢这些人。

要说运气，这就是运气——我自己在想，我就不应该说“留校改造最感困惑黑暗的时期”这句话了！应该看到自己在不幸中还是大幸的——即便是我这样在武斗中打死人的命案犯，即便在清查516这样的特殊时期，我周围的这些人都是文明的清华北大的教授教师们，他们对我都很人道。假设：像我这样大的问题，要是放在广西文化大革命的环境里，那么就一定会被就地杀死，碎尸万段，被人吃掉，死无葬身之地。

一群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精英，被驱赶聚集到野蛮的政治生态环境和极其艰苦的自然环境里。这群精英的每一个个体所散发出的“文明气场”叠加在一起，维持了小环境里最起码的文明。我这个罪犯，委身于“文明气场”里，苟且躲过杀身大祸，得以偷生！还埋怨什么？实乃不幸中之大幸也！要说思想得到改造，这就是我所得到的。

要知道，老教授教师们是根本无罪的，而我是有命案在身的罪人啊！还有善良的陈贯良同学，就是属于情愿自己去死也绝不伤害他人的人！

陈贯良死了，我却没死，因素有几条：文明气场，身强力壮，崇拜名教授感觉高兴、新鲜，没心没肺。

事后拿鲤鱼洲与监狱相比较，前者的生活的确要残酷许多。1971年秋天。我从鲤鱼洲回到清华，肝肿大，怀疑是血吸虫病。我去医院作了检查，医生以“你不是教师”为由，拒绝给我的检查结果出具诊断结论（从校医院医生的眼神里，我似乎觉得他认出了我，故意不下诊断）。直到以后在北京监狱才确诊为血吸虫病，在狱中得到了免费治疗。后来五十几岁体力下降，方知小虫病治疗不会彻底。

▲ 孙：你在鲤鱼洲农场待了多长时间？

▲ 樊：待了一年多，在1971年9月随大伙儿回到学校。随着工农兵学员的入学，学校里逐步恢复了教学秩序，但我们几个有问题的人的处理仍然遥遥无期。可有谁会知道，处理我们的时间窗口已悄然来临。

1973年5月18日下午，学校召开落实政策的宽严大会，一次性处理了所有文革命案犯。主会场设在大礼堂，各系有分会场。我和赵德胜两个人是从主会场被抓走，送进了西城区白纸坊北京最老的半步桥监狱，京城模范监狱“王八楼”。

六、监狱服刑

▲ 孙：别说是清华学生，即便是在社会上，坐牢的也是极少数。在我的印象中，监狱是个很恐怖又很神秘的地方。你的感受如何？

▲ 樊：我对坐牢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并不觉得很突然。但是，毕竟没有进过监狱，刚进去的时候心理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第三天就牙疼，想得最多的是家和母亲。我案情简单清楚，进去后审问过一次就等待宣判了。过了三四个礼拜，理性告诉我，急也没用，于是平稳渡过思想压力期。根据其他犯人的经验，宣判的期限大致知道。和留校改造相对比，平时能够经常见到笑脸，使我感觉得到最起码的人格。只要自己不出错，不会没完没了地对我进行批判。我不再感到苦难遥遥无期。

进监狱不久，同监犯人看到我的《毛选》上写着“清华量零樊思清”几个字，被认为是老蒯的人，遂被优待。在监狱犯人的潜意识里，监狱这地方很怪，案情在社会上影响越大，案犯反而越有优势。杀人犯是“高人一等”的罪名，其次是行凶盗窃，最劣等的是强奸犯。

据我自己观察，犯人的刑期长短与在狱中的地位是正相关的。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罪恶越大服刑的时间越长，在牢里越受苦，监狱方对他越凶狠。其实情况正好相反。犯人刑期越长人越凶狠，越有资格学习技术活。他们学一门手艺或技术，为监狱作贡献的时间会更长、更稳定。附带着监狱方面还能够利用他们去震慑那些刑期短的犯人或刚刚进来的新犯。

可能在监狱当局和犯人的潜意识里，我还是青年学生，而且是清华的，我很快就开始专管劳改队里面的宣传和墙报。我还守住了不说脏话、糙话这个底线；这样做下来，果然不但没有脱离“群众”，反而赢得了尊重。这让我信心大增：即便在犯人堆里，人性还是向着文明。

这是一个模范监狱，参观的高级外宾很多，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宾努等，被关押的名人也很多，如杨宪益、戴乃迭、司孟非等。监狱是中转站，表现不好的就被淘汰去新疆偏远地区的劳改场，表现好的才留下来。监舍里，政治犯与“小佛爷”混合关押。年轻力壮的后者，在生活上和放风时间里可以照顾前者。既可以相互帮助，又可以相互揭发。

▲ 孙：你能举几个你印象最深的人和事吗？

▲ 樊：好。下面所说的每件事，对于我都是一次关于人性的自我教育。

先说一个特务。因为我的案情一清二楚，身体又有劲，被派去照顾过一个半身不遂的特务。那是一个1944年（比我出生还早两年）潜入延安被抓获的特务，已经辗转了好几个监狱。抗美援朝及社会上的历次政治运动，他一概都不了解。据说有儿女，但是没人探亲。连续被关押了30年没有判刑。同监的那些政治犯告诉我：不提审、不判刑、无限期关押是极其不人道，不讲人性的。我这才明白，被判刑相对而言更幸运一些。回想留校改造流放鲤鱼洲也是一种没有期限羁押，看不到头，容易造成精神崩溃而自杀。

再讲一个医生。1979年秋天，我老发低烧，就到公安医院去看病住院，确诊为血吸虫病。给我看病的是李医生，协和医院的老专家，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公安医院。他了解到我在江西鲤鱼洲得了病而没有得到整治，很惊讶我居然又从校医院里面漏掉了。按规定任何人得这种病，必须跟踪监护治疗，切断传染源。犯人没有资格用锑剂，不给报销。其实锑剂的毒副作用很大，对心脏肝脏都没有好处。他教我一个绝招，就是对肝脏进行压迫性按摩，使肝脏周期性地出现缺氧，促使血吸虫进入血液循环系统，这样就比较容易被排泄出来。我就常用两根擀面杖顶着肝区。回武汉后我专门发明了一款按摩器对付小虫肝，使病情逐渐好转起来。以前我只是喜欢右派老师，万万没想到在监狱医院里再次碰到了优异的右派医生。

一个在监牢里还呼反革命口号的反革命分子。这个人叫易本亮，文化水平很低。他介绍自己时老说：俺们是矿工，过去是榜地的，俺们火烧了国务院。“火烧国务院”，多吓人的反革命罪行！原来他是因为对企业基层个别干部的做法不满，在国务院大门口拿捡来的树枝企图点火——火还没点着，就被抓起来了。有一天，他在监号放风的时候突然举起双臂高喊“打倒毛泽东！解放全中国！”这在当时是反动得不得了的反革命口号。我听到的一刹那，整个毛孔打开了，头发都竖起来了。我毫不犹豫地扑过去，把他的双臂束缚起，利用我练过举重的优势，把他推举到我的肩膀上，扛到放风场的墙角抵住十几秒钟，被管教干部铐住后

才放他落地。当时我还是未被宣判的犯罪嫌疑人。1975年5月1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对我宣读判决书，鉴于我在羁押期间有立功表现，予以从轻处理，判处有期徒刑12年。清华与我同类罪行的都至少判处了15年。我立功了，易本亮却被强制佩戴了一个多月的“防毒面具和坦克帽双械具”，防止呼口号、用头撞墙。现在，我每每想起这件事，心里就感到对不起他。他并不是坏人，我的少判刑是建立在他多服刑的基础上的。我有愧，诚恳地向易本亮道歉！

我再说一个北京仪器厂的模具工李厚祥，真正的工人阶级一分子。他是我在监狱交的铁哥们，和电影《老炮》里的老帽一模一样。文化革命一开始，他组织几个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直言不讳地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北京市多次召开枪毙人的公审大会，都会拉他去陪斗。每次他前面的都是死刑立即执行，轮到他的时候就变成缓期两年执行。会后把他交回监狱，验名登记，解开械具。他吐出口中的械具就对公审会的警察说：“你滚回去吧”！监狱当局有人知道他是冤案，对他很优待。他被无罪释放后还常回访监狱的警察朋友。这位老帽还几次解囊接济并教育那些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小佛爷”。他对我说过，别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才会来找你。

他还有一次惊人的表现让我对他心服口服。有一个北京地铁建设公司的职工李贺达也是因为说错了话被打成反革命的，还未判决就生了病。警察说他得的是癌症。这时我这位哥们真急了！“完了！他得了癌症，他家里人不知道咋办？我得想办法去趟公安医院问到他的住址，以便出去以后好告诉他的家人”。李厚祥对我说完以后，就把他自己的左手食指，对准了砂轮机狠狠地磨了一下，把骨头都磨出来了！然后马上报告队长：“我要去医院”。他去了公安医院，要到了李贺达的家庭地址。后来，李贺达真的死在公安医院了。因为死的时候他还是个未决犯，按照规定，未决犯死了以后是不会通知家属的。李厚祥出狱以后，找到了李贺达的家属，把他生前情况和死讯告知了他的父母，并且帮助他的父母写材料上诉平反。李厚祥坚信，他绝对不是反革命分子。如果得不到平反，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还要背一辈子反革命亲属的黑锅！

李厚祥、李医生这些正直的人，身处逆境仍伸张正义，帮助弱者，我一次次地受到人性的教育！

▲ 孙：在监狱里接受人性教育？这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啊！

▲ 樊：是的，对人性的思索和感悟，是我蹲监狱所得到的最高级的收获！

从学校到监狱环境突变，各种人都有，比学校复杂。在那里彼此心知肚明都是罪犯，没有任何遮羞布，谁也不比谁更高尚，也就不分道德优势劣势。说话直截了当，轻松自在，没有任何拐弯抹角。谁要是说话藏着掖着不痛快，就有人会用北京话说你：“装丫挺的”。所以，人性表现为赤裸裸，感觉对话平等了，与学校里说话很不同。

知道自己必死的犯人，把好的衣服和被子留下来送给别人；其他的人把好吃的饭菜送给要走的人，“上路”以前吃个饱。这时大家都是人而不分谁谁，一切都很自然，都是本性使然。

监狱里全是男性，直截了当的性饥渴表现也体现了人性。对比当时社会对老百姓的性禁锢和某些人的虚伪，想起西方弗洛伊德对性的研究，我大受启发。

我在鲤鱼洲农场得了血吸虫病，但清华的校医院就不给我这个有问题的人确证，公安医院的右派专家不仅给我确证了，还教了我绝招。他就比校医院的大夫更具社会责任和人性。。

在监狱里管教干部经常换防，以防止与在押犯逐步滋生猫腻。开始我感到不解，后来理解这还是人性使然。我亲眼看见一个昨天还是管教队长，今天就被关进了监舍的人。他们居然和犯人有猫腻，犯人群体里也分左中右！我不断被开窍。

就说前面提到的李厚祥，他是回民。他看见我是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怕我吃亏，要我在报伙食的时候报回民的伙食灶，可以始终和我在一起。这使我在适应监狱生活的开始

直到后来都从来没有吃过大亏。他是个反革命集团首犯，在监号里一般的犯人都不会去招惹他。

在监狱里有一些受冤枉、受迫害的好人，反革命犯很多，有的很有思想，每天都会让我明白许多事理。我开始考虑人性问题，对普通人性有了初步的启蒙认知。过去不敢想的问题，开始想了；过去不敢说的话，可以说了。慢慢地，我想明白了，我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缺少了人性，是对人的生命的漠视。

真的是，入狱见到了光明，大有视野豁然开朗的感觉。

▲ 孙：除了人性的感悟外，你还有其他重大的收获吗？

▲ 樊：我估计我不会在监狱里待一辈子，我也不可能如我的同学们那样由国家分配给我工作。将来出狱后我以什么职业为生？这是我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我入监一年以后，于1974年5月17日转入北京K字楼监狱五中队参与劳动。因为块儿壮，年轻，监狱派我学习钳工，我干了两年。在恢复高考之前，我辅导两个监狱干部的子女复习功课，这两个人都考取了大学，我就更加“优人一等”了，从钳工升格到机械设计室，有机会拜狱中的那位一机部总工程师、大右派分子为师，做他的“研究生”。我先当辅助后当主持，搞了一系列常规绘图和革新，且胜任了机械设计。会钳工又会机械设计，使我得心应手。六年里累积设计了三十多份（不计标准件，光零件图就超过1000张的）总装图。这样，我出狱以后就有了谋生的本领。

星期天整理了内务有空闲时间，我没有亲属接见就学英语。从头到尾背了一本小英文字典，上面有各种批注，一直被我珍藏到现在。阅读英文版《毛选》，我的英语水平也大有提高。

▲ 孙：你最后服刑多长时间？

▲ 樊：我在1973年5月18日被羁押。1975年5月17日宣判，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应服刑到1985年5月17日。1975年底，我因遵守监规，在技术革新上有重要贡献而减刑2年，这样，应该服刑到1983年5月17日。

1981年5月17日，我被带到五中队队长办公室，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我宣读了《提前予以释放判决书》。意思是说，根据政策，刑期应从主动向我交代，被专案组监管失去自由的1968年8月8日开始计算。

我在监狱里整整服刑了8年，因落实政策提前了2年。

以失去自由开始计算刑期，则我实际服刑时间是12年9个月。

我始终认为，这是文革后在胡耀邦总书记领导下，人性化地处理在文革中的犯罪案件，使我比原定刑期提前2年得以出狱。我心存感激！

七、回归社会

▲ 孙：你刑满释放，这是你人生的新起点。你是如何回归社会的？

▲ 樊：我回武汉先报上户口。为避免母亲因情绪波动而导致精神病复发，我在妹妹家暂住几天后，在两位高中校友的陪同下回到我妈那里，说的是“我们大家一起回武汉的”。

我的爱人是我的老邻居，住在一栋楼。听说我回来了，她下班后来看我。五个月以后我们登记结婚，我成了家。她嫁给我是极具勇气的，这令我非常感动。从那时起我就想：我要对她好一辈子！我的岳父（某报副总编）岳母（美院教授）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被抄家，受到很大冲击。他们对我比较了解，热情接纳了我。我也非常孝敬他们。在我岳母最后离世的时候，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了两次：思清是个好人！

▲ 孙：你出狱时已经35岁，属大龄青年了。能这样快而且圆满地解决了个人的婚姻大事，这的确是件大好事，也为你回归社会开了一个好头。

不知道你的工作问题怎么解决的？

▲ 樊：这就比较难了。体制内的企业拒绝录用我这样的“三种人”。我曾经到大通公司应聘，老总对我的业务能力和英语口语很满意。后来请示关广富，得到“三种人，慎用”的指示，因而泡汤。我因此明白了国营企业用人是受控制的。吴官正学长任武汉市长期间，起用了一些校友。武汉有校友告诉我，在他面前提到过我。当时我就回应说：“我和他是同一个专业的两个极端——劳改局管制的和政治局的。牢牢记住就好！”。体制界限，红黑分明，不去触碰，不去奢望体制内的福利。

我回武汉二十多天后在武昌区一个区办的铸造厂就业。厂长是我的高中同学，他真心愿意接纳我，我也心甘情愿地愿意为小厂服务。厂里派我去部属武汉材保所学习了热喷涂技术，一年多后就和厂里职工共同把这个灰铸件不超过100公斤的铸造厂，改造成热喷涂厂。我一个人兼土建和机械两方面设计，1983年5月建起钢结构厂房，制造了喷涂专用装备。1983年12月21日开始对武汉龟山电视塔最上面的管状钢桅杆实施铝镁稀土喷涂防护工程，一次性保证80年不生锈。几天后湖北省经济电视台播放了施工情况。材保所拿了科技进步奖，且以此确定了《电视塔钢结构长效防腐蚀国家标准》。而我们武汉热喷涂厂赚了钱，同时奠定了我们厂在全国热喷涂行业里的地位；在各地招工、施工，参加行业会议，并成为全国标委会热喷涂专业委员会的标准参与制定单位。后来我们和武汉材保所一直合作到我们厂被武汉市区办企业改制时为止。由此我有机会参加好几个国家重点项目的机械设计，有机会参与热喷涂（焊）国家标准的制定，有机会参与国际热喷涂专业大会论文的翻译评审工作。这是体制内的单位邀请我参与的。

我们进入热喷涂行业后的1984年，我又受命为我厂申请压力容器制造的资质。我是总工程师，负责质保体系的建立和运转，是个细活儿。太忙了，以至于我妈病重临终前，我都没能在她身边陪伴。为了换回我的工作时间，我们厂长专门派了一个女同志照顾我妈。每次想到这儿我就很难过！

1988年，鉴于我凭一技之长为区办企业所作的贡献，被武汉市科技局破格评为武汉市第一批高级工程师，居然与同学同步了。我把机械设计和熟悉的热喷涂工艺相结合，先后为武汉材保所设计过几条机电一体化的生产线。其中，徐州钢铁公司的球铁离心铸管、济南钢铁公司的球铁离心铸管和哈尔滨电机厂的炮弹壳生产线，目前还在使用。

▲ 孙：你凭着真本事，不仅站住了脚，还作出了很大贡献。向你表示祝贺！

▲ 樊：谢谢！由于过去努力，后来有机遇就抓住了。

▲ 孙：在忏悔书里，你几次谈到不再作恶，令我印象深刻。你能谈谈你的心得体会吗？

▲ 樊：在我服刑的时候，我就立下誓言：这辈子不再作恶。在回归社会以后，我一直把这当作我做人的底线。

我做过几件好事。如：

1981年秋，我刚刚上班两个月。我们的客户单位武汉邮电摩托车厂有个女师傅下班过便桥的时候，不慎把手表掉在长江岸边的水里。当时手表值半个月的工资啊！她着急得快哭了。我算计了一下水流的方向和速度，跳下水，一个猛子扎下去，把手表捞起来了。第二天他们厂写了封感谢信送到我们厂里。

1985年春天，我和主管公司的老李同志一起到柳州第二空压机厂去采购无油润滑空压机。在柳州街道上，我看见有几个人正持刀围殴一个女青年，连刺好几刀，女青年倒地

了。行凶的人看见我走过来了，就跑散了。我马上出钱出力，叫了一个三轮车把女青年送到附近的柳州人民医院进行抢救。送去以后，我就离开了医院。事后女青年得救了，医院和医生最后还是找到了我。医生说要是再晚送几分钟就没命了。后来我知道这个女孩的名字叫梁国平（住在柳州雅儒路）。这算是我走出监狱以后做的一桩救人一命的好事。

我曾开办过一个健身房，既当老板又是教练。健身器材是自己设计制造的，只买了杠铃哑铃等标准件和跑步机。2003年3月由于非典疫情，健身房难以为继。歇业期间我以优惠价清退了所有会员卡缴费，停业前清退了所有消费者的预付款。以至于十几年后在公交车上，还经常遇见长大成人的健身小子亲切地喊我樊教练、樊老师！我在武汉市办健身房没有赚到钱，但赚到了人望。

退休后我身体尚好。经社会朋友介绍，我挂靠有资质的公司，以项目部的名义完成了湖北沙市荆州某小区的燃气入户工程。工程款都是我负责垫付的，但燃气已经安全入户使用多年以后，甲方欠我的工程款仍然收不回来。农民工的工资，我一分钱也没有欠，都支付干净了。这件事发生在“信义兄弟”被媒体披露之前。为讨回拖欠的65万工程款，我打了十几年官司。几年前就胜诉了，钱还是要不回来，一直在法院的执行阶段，猫腻重重。诉讼期间，有人提醒我，动农系系友周坚卫是湖北省常务副省长专管省政法口的工作。我思量后，没有请他帮忙。我也拒绝讨债公司介入。不向体制低头和不涉黑犯罪，两头都不，这是我的底线。法治环境的恶劣和我对这个法院的失望，都是体制治理的缺陷，我没有纠正的义务，只能等待结局。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过去我曾是被告，这次我成了胜诉的原告。

我做的都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我心里一直想堂堂正正地做人，时时坚守不再作恶的底线，以社会公民的身份要求自己。宁肯自己吃点亏，也不能损害别人。在市场经济中不行贿，不作恶，这话说起来容易，要做到有时感觉很难，但我做到了。困难在于市场经济中随时会遇到的不平等、不公平。例如有一次，武汉石化厂的某处长是我中学校友，知道我文革的事。我去结账他当时就是不给结，拖了很久才给钱。遇见这样的事，由于经过多年思想的锤炼，我冷静度过。

▲ 孙：法律的意义不仅是惩治罪恶，还在于警戒人们不再作恶。你吸取了教训，不作恶，行善事，做得很好！

在社会的转型期，我们都感到极大的困难和压力，像你这样背有历史包袱的，困难会更多。你能安然度过，真的不简单。

对了，这些年，你的同事，你的下属，知道你过去的事吗？

▲ 樊：我尽量低调做人，倒是武汉市大企业的造反派头头都先后主动造访过我，如武汉锅炉厂的造反派头头沈复礼，还有夏邦银，以及1986年从武监出狱的王大宾。原来是因为蒯大富的1983年3月《刑事判决书》里有我的名字。地质大学搞钻具的顶级教授张国樾指导王大宾办企业，王大宾听说我在搞热喷焊，就来我厂探讨在地质钻头上如何焊钴基合金。直到他的厂搬到都江堰去的初期，我还与他有业务联系。小厂的工人看见造反派的头头来访，就一传十，十传百，把实际情况扭曲了，甚至于造成一种背离——我说的是真话，人家也不相信。我说我是“三种人”，别人反而说“你不是的”。这可能是社会上的人一般都比较看重清华毕业的，也可能是我后来做了一点事，这个社会善意地接纳了我。

▲ 孙：你一直在体制外谋生，经历了许多事情。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故事吧。

▲ 樊：许多难忘的人和事里，我今天只讲一个让我的传统观念发生改变的人。

武汉材保所是我们厂的协作单位。热喷涂室的主任是电机系的高学长，在技术上很有一套的。接触得多了，又是校友，彼此很熟悉，关系也不错。

1992年5月，他决定离开研究所自己办企业。他再三真诚邀请我，希望我能够和他一起干，我答应了。在武汉郊区黄陂创业建了热喷涂厂，我在那里一干就是五年。现在这个厂发展的不错，专门生产数控自动焊机，年产值两三千万元。

出于对老高这个共产党员校友的信任，我一开始并没有与他签订创业协议。刚创业时很困难，他发不出工资，我也不好意思向他要，反过来还借给他2万元给工人发工资。后来转机终于来到了，我在济南钢铁公司帮他签了个大单合同：两条球墨铸铁离心浇铸管道的外表面喷涂铝的生产线，总额720万。合同实施阶段，机械（包括液压气动系统）部分全是我负责，从设计、购买材料、编制制造工艺、机械加工，先在自己厂里组装、安装，再押运整条生产线的零部件到济南钢铁公司现场安装。老高负责电气控制部分。然后机械电气联合调试，试生产，最后把整条生产线交付给用户。

2万元他一直不提还的事，困难已过，大单子来了还是如此。济钢的工程款是我催回来的。5张总额为600多万元的承兑汇票，可直接兑换现金，全部在我手中。我没有扣下一张，催他还我的钱，而是全部如数交给他。但是他依旧以各种借口不还那点小钱。我看他成心这样，就一分钱都没有要，包括欠我的钱和好几个月的工资，离开了这个厂。走前我还替他签了一单357万的合同——万州钢管拱桥外表面喷涂锌涂层的长效防腐蚀。

不只对我这样，他对别人也如此。蒋高工是清华校长的亲侄子，携助手从天津来厂里为他干活，他欠蒋校友及其助手几个月的工资不发。还有力学系张书记帮老高购买镍包铝丝喷涂材料，垫付几千元也没给报销。其他还有不少上不得台面的事情，不一一列举了。

过去我一直对党员很敬佩。高学长如此待我，扭转了我对党员的崇拜，也引起了我的联想、深思：在清华动农系也见过一个姓韩的优秀学生党员在自己所在的新工人群众里借了很多钱不还，且失踪失联的事。最后想起我在鲤鱼洲亲眼所见的：党员军代表自己害怕得血吸虫病，坐在田埂上不下去，把右派和老教授赶进水田里劳动，声称这是思想改造的真实故事。摆在一起思考，我悟出了，共产党员他们与普通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不要把他们看得太高，他们可能更复杂一些，可能党性多了人性更少一些。这次碰到老高这样的共产党员，我决心在诚信方面绝不输给他！他也是促使我对普通人性认识和思考的一个典型实例。

八、忏悔反思

▲ 孙：你回归社会已经37年了。你用几十年的人生证明你早已改过自新，而且是个有作为的清华人。你为什么还要反思，要忏悔呢？

▲ 樊：我在小厂里的日子过得很滋润。厂长、书记待我很好，青年工人也很尊重我，因为我们这个体制外的小厂被不少大厂、研究所、高校所看重，在热喷涂行业中相当有声望。后来我也创业，虽然经历了不少磕磕绊绊，尝过酸甜苦辣，但都挺过来了。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交齐了社保金，于2006年顺利退休。几十年来，我不再作恶，没有违法，本该安度晚年了，但我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做，心里不安。那就是我必须全面清理我的思想，反思作恶的根本原因，对自己的罪行进行真诚的公开的忏悔。

▲ 孙：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忏悔的念头？

▲ 樊：我开枪以后就后怕了。当我得知打死了人，就知道我闯下了大祸，犯罪了。几十年来，在朱玉生的灵魂面前，我无地自容，无法解脱。我想过到朱玉生父母面前认罪尽孝，但难以做到。内心一直在忏悔着，但要表达出来有很多困难。

2014年，孙怒涛校友把他的文革回忆录《良知的拷问》寄给我。开卷之初，只想了解一下学校的有关情况，翻阅了几分钟以后，开始理解了这本书的主旨思想。很快，脑子里就比较乱，那显然是在内心已经联系上了自己。我马上就联想到，我也应该拷问自己的良知。后来，他邀请我为文集《历史拒绝遗忘》写一篇回忆反思文。我有过动笔的念头，但最

后还是没有写成。今天回想起来，还是因为我当时没有深入忏悔，患得患失，没有将心比心，虽多次思想斗争，终未动笔。

当时我的顾虑是：我要是写的话，就只能把自己描写成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一个胆敢向自己同学打冷枪的野兽，任何其他的情节都不能够写入，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演变过程合情合理的描述也很难写入。因为如果那样写的话，恐怕会给人造成樊思清至今仍然不认罪，至今还在为自己辩解的印象。法官在庭审时询问我的时候，我还可以为自己作辩护，但是在写回忆反思文时，就不允许再有任何为自己的辩护的文字出现了。

当时我之所以下不了决心，还因为存有一些其它可以预期的焦虑：我已经不是孤身一人，而是有了家室，有了同事，有亲朋好友。把自己的过去写得那么清楚，公布于众，以后会造成什么影响？亲戚朋友中，尤其是我亲属中的年轻一代，他们不了解文化大革命，他们会怎么看？

▲ 孙：是呀，你的这些顾虑都是很现实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樊：我以前比较低调，比较封闭，与校友之间的交流很少。孙怒涛把我介绍进清华校友微信群，匿名隐身潜水旁听，也是希望我在友好的氛围中受到感染，得到力量，慢慢融合进校友的圈子里。

我在校友群里天天看着大家的讨论，受到大家的熏陶。历史在进步，大家对文革的反思启发教育着我，对我确实是一种启发和鞭策。

在文革五十周年到来之际，我开始感觉到时不我待！为了避免类似文革的人道主义灾难再次在中国发生，为了维护人类共同尊严、生命价值和自由存在的道德、义务，我决心迈出最关键的一步——把我的忏悔写出来。

▲ 孙：你的忏悔文表达了你真诚的忏悔，你的反思文阐述了你深刻的反思，写得都很好！

▲ 樊：公开忏悔，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巨大的考验，需要极大的勇气。我写了一份忏悔书，请王嵩梅在4·22座谈会上宣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座谈会没有开成，就改在5月份的网上讨论会上公开发表。

忏悔书的题目是《我要忏悔——直面我失落的人性》，共分九小节。

前两节首先叙述我在上大学以前的存在状况以及在大学里接受的教育，认识到这决定了我的思想意识，最后参加了清华武斗。

“杀人武斗恶行”这一节是忏悔书的重点，详细叙述了被群体裹挟参加武斗的过程，闻亭开枪杀人场景，开枪杀人以后心理状态的变化，727工宣队进校和平解决大礼堂等。这一切都是为了揭露真相、厘清事实、廓清原本，为后面的忏悔提供了必备的前提条件。

“留校改造”那一节，描写了自己“眼前一片漆黑，无知就无畏，没心没肺的无效改造，仍然看不清前途”的状况，记录了学校迟群谢静宜当局对知识分子流放鲤鱼洲长期羁押，极其不人道、不讲人性的迫害。

“关进监狱”那一节，描述了自己重新认识普通人性，有立功表现，不再继续作恶，从而取得了以后的“忏悔权”。

“出狱”那一节，描述了自己重现“摇篮工程师”本色，自食其力，不但没有继续作恶，而且不断在为社会作贡献的亲历。

接着就是写于2016年4月4日清明节的《我的忏悔词》，以及进一步袒露思想的“我的忏悔观”。

最后写了一段别致的小诗，抒发了一下“解脱感”。

我发表忏悔书以后，校友们热议了三四天，对我的忏悔和反思给以热情的鼓励和肯定！要是没有这么一个友善、宽容的小环境，我要迈出这一步，顾虑会更多，困难会更大。这种

氛围是清华人在持续多年的反思文革中逐渐形成的，很不容易。我感谢所有为此作出努力的人们，特别要感谢极力推进两派和解的老师和同学们。

▲ 孙：你的忏悔书很长，有 2 万 5 千字。内容很丰富：既有忏悔，又有反思，更有心路历程的披露。为了突出忏悔书的忏悔主题，我打算把你武斗前的大学生活和武斗后留校改造、关进监狱、出狱以后等章节内容移到访谈录里，还要请你专门写一篇反思文。

▲ 樊：我以前的认识很浅表，仅仅停留在批判江青“文攻武卫”这样的具体问题上，对自己的要求也只是多做好事不作恶这样的层面。反思都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没有也不敢探究外部的原因。通过梳理，我不仅对我犯罪的自身原因比过去认识深了，我认识到阶级斗争诱发人性之恶，是万恶之源，认识到文革的始作俑者应负第一位的责任。这是我这两年来通过深入思考获得的最大收获。

▲ 孙：思清，这几年来，你一步一个脚印，走得不轻松，但是走得很坚实。记得我曾问过你：如果要向社会公开你的忏悔书，你同意吗？你当时坚定地回答：同意。这几年，大环境在不断恶化，文革浩劫被某些人洗白美化成“艰辛探索”。你面对不可预知的风险，坚持反思，坚持忏悔，我向你表示由衷的敬意！

▲ 樊：我忏悔了，但是我过去的历史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我现在这样做，不为别的，只希望后人们以我为戒，永不作恶。我也盼望我的余生和我的家人都平静安宁。

孙：好人总有好报！祝福你和你的家人幸福安康！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 50 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 年 5 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